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的政府债务观研究

张光先¹杨柳依²

(1.广州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2.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政府债务理论的重要起源。本文重点探讨了该学派几位代表人物的政府债务理论, 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古典学派普遍持有“债务悲观论”这一共识, 即对政府债务的态度较为负面。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支出缺乏生产性, 会抑制经济增长; 二是古典学派中大部分认为债务融资在国家经济中并未发挥关键作用; 三是古典学派认为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储蓄和投资自动实现平衡, 借贷并非必要的平衡调节工具。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这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归纳了不同代表人物的政府债务观, 并对其思想进行初步评价。通过理论的比较与反思, 本文尝试揭示其在历史背景下的内在逻辑及演变过程, 以期为当代财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古典学派; 政府债务; 非生产性; 政府筹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26

1. 引言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现代公共财政的起点。在此之前, 政府债务实际上是英国君主的私人信贷^[1]。随着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 政府债务逐渐转变为公共债务, 由代表全国公民的议会承诺使用特定税收收入中的一部分来偿还。这一筹资制度在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同时, 降低了公共借贷的成本。随着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全球性战争, 特别是长达 20 多年的拿破仑战争, 英国的公共债务迅速膨胀。数据显示, 英国的公共债务从 1691 年的 310 万英镑上升到 1819 年的 84400 万英镑。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 因战争导致的债务 (主要用于军事支出) 始终占公共支出的 80% 以上。即便在接下来一个世纪中, 名义公共债务几乎没有减少, 1913 年这一数额仍为 71100 万英镑, 然而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降至 26%^①。这表明, 英国并未实际偿还大量债务, 而是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来显著降低了公共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这一现象与古典学派中的“债务悲观论”及其预期的财政或经济危机大爆发的后果背道而驰。

古典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提出了各自关于政府债务的见解。他们普遍持有一种谨慎甚至悲观的立场, 认为政府债务会削弱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 斯密将政府的非生产性角色置于批评的中心, 而李嘉图认为政府通过借贷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因为理性的个人会预期到未来的税收负担。然而, 这些理论在当时被用来解释英国的财政困境时, 似乎没有完全预见到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债务比率的自然下降。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使得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希腊马其顿大学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勒弗特里斯·楚尔菲蒂斯 (Lefteris Tsoulfidis) 指出,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先进的政府债务理论, 但是这些理论常常被简要提及, 相较于价值论或分配论, 它们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 斯密对国家非生产性角色的定位以及李嘉图等价性假说等理论, 常作为公共财政或经济类书籍的开篇而一笔带过。楚尔菲蒂斯认为,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债务的见解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应当得到更深入的探讨^[2]。

作者简介: 张光先(1982—),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财政政策;

杨柳依(1991—),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地方债与绿色金融。

通讯作者: 杨柳依

基于此, 本文以英国公共债务的历史发展为背景, 深入探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政府债务的观点及其现代意义。本文首先回顾英国政府债务从私人借贷向公共债务的转变过程, 以及这一转变对英国财政制度的深远影响。随后, 本文将详细分析古典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的主要理论, 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家非生产性角色定位、李嘉图等等价性假说以及马尔萨斯和穆勒对债务的批判性看法。最后, 通过理论的比较与反思, 本文尝试揭示其在历史背景下的内在逻辑及演变过程, 以期为当代财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2. 英国古典政治学派的政府债务观分析

2.1 亚当·斯密的政府债务观

在重商主义时期, 英国政府通过监管、公共企业和征税来控制经济市场。重商主义的支持者认为, 公共债务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损害。因为债务只是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 就像“从右手转到左手一样,” 如果身体能够得到必需的食物, 只要食物分配得当, 身体就不会被削弱^[3]。然而, 亚当斯密对此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认为这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 未来赎回债务所带来的税收压力, 将导致国内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 最终损害国内的生产者和经济活力^②。斯密在其 1776 年发表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 欧洲各国的巨额债务积累过程几乎是一样的, 公众长期承受债务负担, 久而久之, 国家甚至可能因此而破产^[4]。这一观点反映了斯密对政府债务的深刻忧虑。他认为, 债务不仅会导致国内经济的不稳定, 还可能引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严重威胁。

因此, 斯密主张通过税收等手段将政府债务降至为零, 借此“解放公共收入”, 不再用于偿还债务。他在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英国当时的税收体系, 提出了具体的税收建议, 说明哪些税种的增加是公正的, 且对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损害最小。然而, 斯密也承认, 政府通常“不愿意”, 也“不能”采取这些措施。政府由于害怕得罪民众, 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避免大幅度增税, 因为过高的税收会导致人民对战争的反感。

斯密还提到, 通过借贷方式, 政府可以在仅作少量税收调整的情况下为战争筹集资金, 这比大幅度增税更为温和。然而, 他对政府未能建立足够的沉淀基金感到遗憾, 认为应在平时时期通过财政手段迅速减少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他强调, 如果战争支出完全依赖当年的收入, 税收的负担将不会持续超过战争的时间, 但事实往往是通过借债来延缓这一负担。斯密认为, 战争时期的债务虽能暂时维持私人经济的运作, 但一旦战争结束, 过度的债务和相应的征税负担会抑制私人资本的积累, 进而阻碍国家财富的增长。他还指出, 依赖税收而非债务为战争提供资金有一个附加的好处, 即战争的持续时间可能会缩短, 因为民众更容易感受到战争的经济压力, 从而促使政府尽快结束战争。

斯密特别强调了公共债务对土地和资本的负面影响, 认为这些资源将因承担债务偿付的税收负担而遭受破坏, 导致农业、贸易和制造业的全面衰退。他引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共和国、以及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债务危机案例, 借此说明债务如何削弱国家实力。针对英国的公共债务问题, 斯密建议增加土地税、印花税、关税和消费税, 并将这些税种扩展到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 以加快筹集资金迅速偿还债务。然而, 斯密也清楚地认识到, 对殖民地征收更高税收将面临极大的政治阻力, 这使他对英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抱有相当悲观的态度, 他认为, 如果英国无法解决债务问题, 那么继续维持对殖民帝国的幻想将是毫无意义的。

斯密的这些观点不仅是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也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讨论公共债务和税收问题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的观点预示了公共财政政策中可能出现的债务陷阱, 并强调了平衡债务与税收的重要性。

2.2 大卫·李嘉图的政府债务观

斯密是从大量的历史观察中得到他个人的理论见解, 但大卫·李嘉图的方法却完全不同。李嘉图以其严谨的理论逻辑见称, 较少关注现实情况, 更多依赖逻辑推理来论证经济理论。是作为分配和增长理论发展的先驱, 1772 年出生的李嘉图对公共债务的反感甚至超过了斯密。李嘉图主张战争应该完全通过税收筹资, 并极力倡导通过征收一次性资本税(即对国家财产的一次性征税)来完全赎回现有公债。为了论证他在公共债务辩论中的激进立场, 李嘉图借助了他的两项核心理论。首先, 他认为现行的筹资制度下, 偿还债务所需的税收会损害资源在生产过程

中的有效分配。特别是,严重依赖间接税或仅对部分生产者的利润征税,会扭曲相对价格,从而使英国经济偏离其“自然平衡”状态,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李嘉图通过其在分配理论背景下对税收归宿的经济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

李嘉图认为,一个规模尽可能小、没有公共债务的政府最有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人民福利。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写道:“资本的积累是国家财富的基础,只有在资本得以自由增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能得以持续”^[5]。他坚信公共债务的负担会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大量的税收将减少私人部门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从而抑制经济活动。

李嘉图主张,完全赎回公共债务不仅对土地和资本所有者有利,也同样有助于工人阶级。他指出,工人阶级将立即受益于更高的实际工资,这主要是由于间接税的减少以及对土地租金和利润减免带来的更多投资,从而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在他的分析中,税收通过扭曲市场价格和减少资本的有效运用,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李嘉图认为:“任何额外的税收都会导致资本的积累放缓,因为税收会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剩余资本”。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偿还公共债务,持续的高额债务会通过高额税收损害国内资本的增长,这将导致国内资本流向国外,从而减少国内的投资和生产力。他特别担心税收负担会促使资本外流,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的停滞,同时也阻碍外国资本的流入。他认为:“资本在追求最高利润率的同时流向那些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因此国内的过度税收会导致资本的逃离”^[5]。这将带来两种负面后果:(1)国内经济增长显著下降;(2)由于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部分群体如土地所有者和非移民工人的福利反而可能会相对提高。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布坎南在讨论政府债务与税收的关系时,将巴罗在其著作《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提出的税收与债务融资等价观点的起源归于李嘉图。根据巴罗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代际利他、一次性税收等),如果公众具有理性预期,那么无论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还是直接增税进行融资,最终的经济影响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债务融资所引发的赤字将会导致未来的税收上升,而理性公众会预见到这一点,并通过调整当前的消费来减轻未来税负带来的影响^[6]。布坎南将这一理论称为“李嘉图等价性假说”,但事实上,这一假说的思想并非直接源于李嘉图。虽然李嘉图确实认为政府债务和税收的负担可以相互替代,但他也指出,在现实中,公众并不总是理性行事。李嘉图意识到,许多情况下公众会被持有公共债务的“财富幻觉”所迷惑,进而未能充分考虑未来的税收负担^[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写道:“如果一个人被要求每年支付100英镑的税款,而不是一次性支付2000英镑的税款,他很少会理智地认为这两者的价值是等同的。因为他不愿为了未来而进行更多的储蓄”。此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等价性假说提出了进一步批评,认为即便假设公众理性,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因素(如信贷约束、非代际利他行为等)使得债务与税收的效应并不等价^[8]。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债务融资可以通过增加支出和刺激需求来促进经济复苏,而简单的税收提高可能会抑制私人消费,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9]。

因此,李嘉图明确反对巴罗等价性假说的严格版本,尤其是在政府债务与税收对公众行为影响的差异上。李嘉图主张,基于债务的融资方式会对国家资本产生更大的破坏,因为公众在面对年度税收与一次性税款时,往往不能理性地权衡其真实价值。他认为贷款制度比等量的重税制度对国家资本的侵蚀更为严重,因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倾向于通过税收而非债务来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尤其是在战争期间^③。

李嘉图的政府债务观为我们提供了严谨的逻辑框架,尤其是在理性预期和资本积累方面。然而,在应对现代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其观点仍需与现代理论相结合,找到更为平衡的政策选择。

2.2 大卫·李嘉图的政府债务观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经历了一场严重而漫长的经济萧条。曾为政府军事服务的大批劳动力重返私人劳动力市场,正如李嘉图所预测的那样,这为地主、企业家和商人提供了以较低成本雇佣劳动力的机会。然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从这一时期的经济现实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他在实际的经济衰退背景下,部分反对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公共债务的普遍看法。马尔萨斯在原则上同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即高额

的公共债务及为偿还债务而必然征收的高额税收对整个经济，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具有负面影响。然而，他强烈反对李嘉图主张的通过大规模征收资本税在三年内彻底消除英国公共债务的计划。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会给劳工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会对整个英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马尔萨斯的反对立场部分源于他对“萨伊定律”的质疑。萨伊定律主张“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即生产所产生的收入足以购买所有生产的商品^[10]。然而，马尔萨斯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作用。他认为，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上的供需并不会像萨伊所说的那样自动平衡，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萧条实际上揭示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长期不平衡，尤其是在军事需求下降后。

在马尔萨斯看来，1815年战争结束后，劳动力市场上的大量劳动力释放以及军事装备需求的减少导致了有效需求的显著下降^[11]。国民产品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高额战争开支终结后，私人需求并未迅速增长来填补这一空缺。正如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写道：“生产受到了决定性的制约……国家的资本和收入的减少，使得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工人们的生产也不能确保获得足够的利润”^[11]。

因此，马尔萨斯坚信，李嘉图主张的通过大规模资本税迅速赎回公共债务的计划将会加剧英国经济的困境。他认为，资本家、地主和中产阶级作为公共债权人，不可能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来缩小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而债务赎回带来的国民产品的新分配将进一步扩大这一差距。马尔萨斯强调，社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富裕，反而会陷入更深的贫困^[11]。

马尔萨斯的这一论点与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忧虑相呼应，他补充并修正了古典经济学派中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乐观预期。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的是，他虽然认同公共债务的潜在危害，但他反对通过大规模资本税来迅速清偿债务的方式，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需求进一步下滑，进而加剧经济困境。马尔萨斯的理论为后来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管理的政策提供了早期的理论支持，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公共支出刺激需求的做法^{[8][9]}。

2.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观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理论。穆勒出生于1806年，到1848年发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时，他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英国国债负担随着经济增长在不断减轻。穆勒对公共债务的看法与亚当·斯密的判断并无太大不同。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七章关于国家债务的内容中，穆勒指出：“如果从政府贷款中获取的资本是用于生产或注定要用于生产的资金，那么公共债务融资将导致恶果”^[12]。

穆勒认为，利用资本税从政府贷款中抽取的资本“相当于从劳动阶级的工资中抽取金额”。但与斯密甚至李嘉图不同，穆勒严格反对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公共债务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因为他认为政府支出通常是非生产性的。穆勒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情况：

1. 外国资本，“世界普遍积累的溢物”，这是可以用于债务融资的资金来源之一。

2. 国内资本，“除非这种投资方式对它开放，否则它根本就不会被保存下来，或者在被保存下来后，会被浪费在非生产性企业中，或者被送到外国去寻找就业机会。”

3. 利润率下降：“当积累的进展使利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低于这个程度，就会停止资本的增加，或者把全部新积累送到国外去；政府每年可以拦截这些新积累，而不影响劳动阶层的就业或工资。”

穆勒认为，从以上三个来源获得的资本将构成公共债务融资的“极限”。国家是否超过了这个限度，可以通过一个指数来诊断：“这既是一个确定的指标，也是一个明显的指标。政府是否通过其贷款业务提高了利率？……当他们确实提高了利率，就像他们在法国战争期间以最特别的程度所做的那样，这就正面证明了政府是生产性投资的普通渠道的资本竞争者”^[12]。

在穆勒定义的限度内的贷款，“除了支付利息外，当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损失，甚至可能对劳动阶级有利”，因为它本来会离开国家的资金在军事部门创造就业。当在“限额”内的债务融资和通过增税完全覆盖战争（或紧急）开支之间进行选择时，穆勒建议“一个国家的审慎应该支配着与个人的审慎相同的行为；立即接

受容易承受的尽可能多的匮乏，只有当任何进一步的负担会使他们过于痛苦或残废时，才通过抵押他们的未来收入来提供剩余的费用。”

尽管穆勒承认经济增长本身能够减轻债务负担，但他与斯密一样，对赎回债务的问题仍然持肯定态度。他权衡了支持或反对“通过普遍缴款或通过剩余收入逐步”偿还国债的两种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般捐款只是一种财产税，那么有可能一举消灭国债。除此之外，“唯一既公正又可行的消除或减少国债的方式是通过盈余收入的方式”^[12]。穆勒驳斥了这样的论点：与其为此目的提高税收，不如让钱“在人民的口袋里生根发芽”。人们很可能把留在口袋里的一部分钱存起来，“但他们极不可能把全部钱存起来：而如果通过征税，用于偿还债务，全部钱就会被保存下来，并成为生产力”^[12]。这与后来凯恩斯主义在储蓄方面的思想相似，但在偿还债务方面则有所不同。穆勒建议，“在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国家”，由此增加的收入“宁可通过减税来处理，也不要通过清偿债务来处理，只要还有任何非常令人反感的税款”。甚至在这之外，明智的做法是“通过试验性地减少这些税收来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直到发现在某一点上可以在对贡献者的压力最小的情况下增加一定数量的收入”^④。

穆勒对“一定数量的国债是可取的，而且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作为对社会中较贫穷或较缺乏经验的部分的储蓄的投资”这一论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投资于政府基金的唯一好处是国家担保，但这将建立在强制征税的基础上。穆勒建议建立一个“影响全国的国家存款和贴现银行”。该机构的费用将由存款和商业、土地或其他证券的贷款之间的利率差来支付。这样一个机构“将使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保险公司，为社会上靠财产利益生活的那部分人提供保险，防止他们因那些可能需要倾家荡产的人的破产而失去财产的风险”。

穆勒的政府债务观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对公共债务的警惕态度，又加入了更多的理性分析，特别是在债务融资限度和资本使用方面。他强调，政府应当慎重使用债务融资，并优先通过盈余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确保债务负担不会过重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这一立场展现了穆勒对财政政策的审慎态度，并为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3. 评价与总结

尽管政府负债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现实问题，涉及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它始终是经济学理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债务问题愈加严峻，这使得重新审视历史理论更具现实意义^{[13][14]}。基于此，本文对西方经济学中古典学派的政府债务观进行讨论和挖掘，借以讨论古典学派中政府债务理论的发展和演进脉络。对债务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洞见历史长河中纷繁复杂的政府债务问题及本源所在，还可以管中窥豹，理解不同学派的独特观点以供后世参考。总体而言，古典学派中对待政府债务的态度较为悲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倡导的债务有益论形成鲜明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公共债务问题上基本达成一些共识：公共债务通常源于战争等紧急情况，这是对经济资源的浪费。但即使在和平时期，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同样视政府债务为有害的，不可持续的。究其原因，或许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用以解释。

首先，古典学派认为，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虽然政府支出旨在履行必要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通常无法或者不应该由私人部门承担，但这种支出耗费了已创造的社会财富，从而被视为非生产性。

其次，对于英国而言，公共债务的增长多与战争相关，政府为这些非生产性目的借贷占用了资本，这些资本本可用于私人投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除马尔萨斯外，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未能充分理解税收和债务融资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古典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是自发建立的，无需外部调控。因此，借贷用于公共支出在他们看来削弱了经济积累的能力，损害了财富的创造。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盛行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的理念，也对古典学派的债务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古典学派推崇小政府的意识形态，使其对政府借贷持更为保守的态度。

18世纪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盛行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理念，支持小规模政府与自由市场的意识

形态对古典学派的债务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历史角度分析, 古典学派有关政府债务的讨论并未引发大规模的财政或经济危机, 这主要归因于 19 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盛行的个人主义文化。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各国普遍保持了良好的主权信誉。尽管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较高, 但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通常能够得到迅速清偿。此外, 财富的快速积累进一步增强了各国的债务偿还能力, 因为私营经济在当时高效运作, 且受到政府干预较少。直到今天, 民主国家仍然主导全球政治体系, 受宪法和公众监督的约束, 各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上也愈加审慎^{[15][16]}。

总的来看, 古典学派对政府债务的悲观态度反映了他们对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经济自我调节的坚定信念。在 19 世纪, 这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 促使各国更加重视财政审慎和债务管理。然而, 随着现代经济复杂性的增加, 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政府债务问题愈发显得多样化和深远^{[17][18]}。当前各国在应对公共债务时, 既要汲取古典学派的历史经验, 又需结合实际经济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正如一些学者指出, 适度的政府债务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而非阻碍^{[19][20]}。因此, 重新审视古典学派的理论,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经济背景, 也为当前全球债务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在全球债务不断攀升的今天, 各国如何在平衡短期需求与长期可持续性之间找到最优路径, 将继续考验现代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智慧。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 Mitchell& Deane (1962)。

②在斯密反对政府债务之前, 大卫休谟及提出了政府债务有害论的论断。他在 1752 年首次出版的政治论文《论政府信用》中对英国的公共债务问题提出这样的论调: 要么国家必须摧毁公共信用, 要么公共信用将会摧毁国家。休谟认为, 公共债务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事实上, 休谟的这种论调是对国家安全的财政必需和由负债融资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之间联系的一种思考。我们这里暂不具体讨论休谟的政府债务观。

③关于李嘉图对公共债务的看法来自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以及他在 1820 年出版的《筹资制度》。

④这里我们看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被称为拉弗曲线的想法的起源。

参考文献:

- [1] Ellefson, A.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 Ware,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J]. Teaching History: A Journal of Methods, 1992, 17(2): 81-82. DOI: <https://doi.org/10.33043/TH.17.2.81-82>.
- [2] Tsoulfidis, L.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public deb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07, 54(1): 1-12.
- [3] Melon, J. F. A Political Essay upon Commerce [M]. Dublin: Philip Crampton, 1738.
- [4]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drew Skinner, Books I-III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original ed. 1776].
- [5]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1817.
- [6] Barro, R. J.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1095-1117.
- [7] Blaug, M.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 [8]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1936.
- [9] Blanchard, O., & Perotti, R.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117(4), 1329-1368.
- [10] 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Crapelet.1803.
- [11]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2nd ed., 2 vols., ed. by P. James [M].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original ed.1803].
- [12] 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V, Chapter VII: Of a National Debt [EB/OL].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Access:http://oll.libertyfund.org/?option=com_staticxt&staticfile=show.php%3Ftitle=243&chapter=7243&layout=html&Itemid=27, Retrieved 5 Nov. 2012.

[13] IMF. Global Debt Database [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2.

[14] OECD. Sovereign Borrowing Outlook 2021 [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15] Lindseth, P. Power and Legitimacy: Reconciling 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 Pavlov, V., Haskel, J. Government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A Long-Run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6.

[17] Furceri, D., Zdzienicka, A. The Effects of Public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dvanced Economies [R]. IMF Working Paper, 2013.

[18] Arcand, J. L., Berkes, E., & Panizza, U. Too Much Fin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5, 20(2): 105-148. DOI: <https://doi.org/10.1007/s10887-015-9115-2>.

[19] Blanchard, O.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4): 1197-1229. DOI: 10.1257/aer.109.4.1197

[20] Reinhart, C. M., & Rogoff, K. S.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 573-578. DOI: 10.1257/aer.100.2.573

Research on the View of Government Debt in the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Zhang Guangxian¹, Yang Liuyi²

(¹ School of Accounting,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China; ²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is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modern government debt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 debt theorie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is school, including Adam Smith, David Ricardo, Thomas Malthus, and John Stuart Mill. The Classical School generally held a consensus of "debt pessimism," reflecting a predominant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government deb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perspective are: first, classical economist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lacked productivity and would hinder economic growth; second, most classical economists argued that debt financing did no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rd, the Classical School believed that market mechanisms could achieve equilibrium through savings and investment, making borrowing an unnecessary balancing too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heor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mmarizes the government debt views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s, and provides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ir ideas. Through theoretical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se theories with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fiscal policy.

Keywords: Classical School; Government Debt; Non-productivity; Government Financing